

从拓跋鲜卑的南迁看游牧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特日格乐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拓跋鲜卑曾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每一次迁徙都将他们带到新的生存空间, 从拓跋鲜卑的南迁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游牧民族随着自然环境转变而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使他们迅速强大, 从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游牧民族这种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对今天的人们应该有所启发, 拓跋鲜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采取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

关键词: 拓跋鲜卑; 南迁; 适应环境; 能力;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拓跋鲜卑源出东胡, 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一个缩影。发迹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 之后逐步南迁, 并且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 其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也旋即产生转变。

拓跋鲜卑人的远祖生活在大鲜卑山的漫长岁月里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以狩猎为主, 辅以采集业, 他们的社会制度也仅仅停留在氏族部落时代。当他们走出深山危谷, 一来到广阔的蒙古草原, 便从匈奴人手中学会了游牧, 同时很快走进奴隶制阶级社会。建立北魏王朝不久, 拓跋鲜卑马不停蹄地迁都洛阳, 进入中原地区的他们很快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从事起了农业, 他们的孝文帝也完成了封建化的改革。鲜卑拓跋部貌似平常的举动却蕴藏着不寻常的奥妙, 游牧民拓跋鲜卑根据地理环境改变经济生产方式的能力在其后的许多游牧民族身上都有所体现, 而且这恰好是农耕民族所不具备的。今天的人们应该从游牧民族这种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一定的启发。那么, 就让我们踏上拓跋鲜卑的迁徙之路, 重温他们传奇的南迁经历, 去感受他们在迁徙中的变化和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

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拓跋鲜卑从什么地方开始他们漫长而艰苦的迁徙。《魏书·序纪》载: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 或内列诸华, 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 受封北土, 国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 广漠之野,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 淳朴为俗, 简易为化, 不为文字, 刻木纪契而已, 世事远近, 人相传授, 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 北俗谓土为托, 谓后为跋, 故以为氏。”^[1]关于引文中所说的“大鲜卑山”,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学界对此争论了很久, 随着嘎仙洞北魏石室的发现, 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虽说有少数学者仍持有异议^①, 但是大兴安岭北部为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拓跋鲜卑的先祖在嘎仙洞及其附近渡过了漫长的时光, 到《魏书》中记载的第一位“皇帝”成皇帝毛的时候, 已经“积六十七世”^[1], 再到“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2], 已经过了七十余世, 最保守地估计,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一千年之久。拓跋鲜卑的先祖在大鲜卑山的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什么样的经济生产方式, 他们的社会组织又是什么样子的,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根据史书和在嘎仙洞以及周边的考古发掘证实, 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北部期间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业。上述引文中已经说到, 拓跋鲜卑的先祖在大鲜卑山曾经“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但是在

兴安岭那样高纬度、高海拔的原始森林中大规模的畜牧迁徙是不可能的，因此，射猎应当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一点已被嘎仙洞鲜卑石室地下文化层出土之器物所证实。嘎仙洞探沟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陶器碎片均为手制夹砂陶，未见轮制细泥陶，有的夹粗砂，有的夹细沙，烧制火候低，陶色不均，仅见一完整的敞口罐，通体有竖向压光暗条纹，另有个别陶鬲残片。石器有石镞、石矛、刮削器等，石镞有三角形、桃形、柳叶形三式。骨器有骨镞、骨锥、钻孔骨板和劈裂为两半的狍类丹脰骨等。还有狍角器、野猪牙饰和大量抱、獐、犴、野猪等兽骨。由此可知，嘎仙洞出土的陶器的器类单纯，且出土的只有石镞、骨镞等狩猎工具，没有农业和牧业生产工具，再者，兽骨皆为野生，未见家畜骨骼。因此，当时活动在这里的古人只能以狩猎经济为主，且年代尚早。”[3]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提出：“（嘎仙洞）出土的细石器较多，且用途广泛，其中有的是用来射猎（石镞、石矛），有的是用来切割（如刮削器、石叶），有的则用来钻孔（如尖刻器）。从石镞和石矛的制作业已趋于定型化且制作精细来看，表明拓跋鲜卑先祖的狩猎经济已经有了长期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水平。”[4]考古资料虽只能证明拓跋鲜卑早期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为狩猎业，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采集业。

拓跋鲜卑的祖先最早就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一带，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密林中栖息着取之不尽的飞禽走兽，丰饶的动植物资源自古以来就是森林狩猎民族的天然王国，拓跋鲜卑的先祖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靠狩猎、采集为生。高纬度、高海拔的大兴安岭地区为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丰富，拓跋鲜卑的先民们在嘎仙洞及其周围生活得漫长的岁月里，所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为狩猎业和采集业，这是必然的选择，明智的选择。

众多学者在著书立说时虽措辞各异，但表达的意思大体相同，即“拓跋鲜卑的先人们居住在大鲜卑山的密林深处，只能以野生动植物为生活资源，吃兽肉，穿兽皮，过着不定居的游猎生活，经济生产十分落后，属于原始的攫取经济。”笔者略感此说欠妥，拓跋鲜卑的先人们居住在大鲜卑山的密林深处，只能以野生动植物为生活资源的确是事实，但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落后的，而是最适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合“大鲜卑山密林深处”的自然环境。狩猎和采集业是最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最先进的，拓跋鲜卑人找到了这一方式。

二

采用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拓跋鲜卑人在大兴安岭中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魏书·序纪》中记载：“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1]可见其势力之兴盛。随着部众的增加，大兴安岭狭窄的生活空间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整个部落的需要，他们急需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需要走出山林的拓跋人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为西进走向呼伦贝尔大草原，二为向东进入松嫩平原，拓跋人在其首领宣帝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大泽。”[2]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学界对拓跋鲜卑人南迁之“大泽”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即今天的呼伦湖一带。拓跋鲜卑人从嘎仙洞南迁大泽的时间，林干、杨军、宿白、黄烈、曹永年、靳维柏、李逸友等先生认为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5]，姚大力先生推定的时间较晚，则认为是在“公元2世纪中叶”。[6]

随着拓跋鲜卑遗存的不断发掘出土，学界对此问题也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的形制、随葬品数量和种类以及器物组合等方面的变化，对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拓跋鲜卑墓葬进行了分期，将拉布达林、札赉诺尔、七卡、完工等地的遗址认定为第一期，即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末[7]，并认为四处遗址为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途中及在“大泽”周围居住时留下的遗存。[8]关于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时间，笔者认为，得出准确年代的可能性较小，原因有二。第一，拓跋鲜卑人离开大鲜卑山时已经是“统国三十六”的大部落，其迁徙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定是分批、分阶段逐渐完成的；其次，即使拓跋鲜卑人南迁至大泽一带，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会不断地在迁徙，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土地。故而史书中称，南迁大泽后，他们认为该地区“厥土昏冥沮洳”，而谋更南徙。[2]

通过上述墓葬，我们不仅可以大致推定拓跋鲜卑“南迁大泽”的地点和时间，而且还可以窥知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拓跋鲜卑人所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在完工和札赉诺尔的墓葬中，殉牲有牛、马、山羊和野猪，而且有的墓葬，殉牲的数量很大，说明牲畜不仅被饲养，而且数量也很大，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以弓弭、骨镞为代表的大量骨器也说明还有一定比例的狩猎经济，样式各异的桦皮器则说明拓跋鲜卑还保持着森林居民的一些特点。

在大兴安岭中度过了千余年与世隔绝生活的拓跋鲜卑人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后，短时期内掌握了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老师，统治了蒙古草原几个世纪的匈奴人。通过与上述完工墓葬与札赉诺尔墓葬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时代稍晚的完工墓葬具备了更多匈奴文化的因素。^[9]

南迁大泽的拓跋鲜卑人选择了游牧作为自己的生产方式，原来所从事的狩猎业，在他们的生活中渐渐地处于从属地位。完工与札赉诺尔墓葬相比，时代较晚的完工墓葬受匈奴文化的影响更深，已经见不到森林居民的痕迹。^[9]

从以上材料可以推测出，随着迁入新的地理环境中，拓跋鲜卑人发现他们在大兴安岭中的生存方式已经不适合“大泽”周围的自然环境，他们从山上带下来的狩猎工具在这里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处，他们开始从匈奴人手中学习游牧技艺，因而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不论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选择了最适合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

三

按世袭计算，拓跋人自南迁大泽至献皇帝拓跋邻，下传了七代，在“大泽”周围居住了一百年左右。^[10]由于找到了适合于大草原的经济生产方式，拓跋鲜卑人的实力进一步提升。当拓跋推寅带领族人来到“大泽”之伊始，便“谋更南迁”，但“未行而崩”^[2]后，南迁的想法暂时被搁浅。然而经过七代的繁衍生息，随着拓跋人实力的增强、部众的增多，呼伦湖一带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领土，史书中称他们得到神人指点^②：“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1]，亦可说明这一点。

在神人的指点下，拓跋鲜卑人开始又一次南迁，寻找足以建都邑的土地。这一次，带领他们南迁的首领为献皇帝拓跋邻。此次迁徙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遇“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后来在“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引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2]“匈奴故地”即指匈奴发迹的河套及阴山大青山一带。大体迁徙路线请见附图。

根据世袭推算，拓跋人离开“大泽”应在公元160至170年左右。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为了表彰拓跋邻在南迁中的功绩，族人尊其号为“推寅”，与带领拓跋鲜卑从出崇山峻岭的宣皇帝拓跋推寅同名，人们称之为“第二推寅”，此人参与檀石槐所建立的鲜卑军事联盟（公元156年至181年间存在），并成为西部大人之一^[11]；属于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留下的南杨家营子遗址出土了东汉晚期五铢钱^[12]，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考古工作者对所发掘的拓跋鲜卑遗迹的第二期（公元2世纪初到公元2世纪下半叶）认定为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途中留下的遗迹。考古工作者同时指出，这一时期的拓跋鲜卑人的遗存呈现两个特点：一，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是畜牧业比重的增大和狩猎业比重的进一步降低。这方面表现为殉牲以牛、羊、马为主，野生动物几乎不见，镞、弓弭剧减，桦皮器也基本不见，而铁质器类和金银器的出现表明拓跋鲜卑的社会生产力又有所提高。二，东部鲜卑的文化影响在逐渐增大。^[13]

刚刚来到“匈奴故地”的拓跋人实力一度强盛，拓跋邻之继承人，“圣武皇帝诘汾率领数万骑田于山泽。”^[2]可以看出拓跋鲜卑部众之盛。公元220年，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即位，不久便被檀石槐军事联盟中其他的西部大人击溃，而“国民离散”，不得不“依于没鹿回部大人寔宾。”^[14]此后，力微杀寔宾之子后“尽并其众，逐步大人，悉皆欢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14]此后，由于受到其它部族、政

权的影响，其势力时大时小，所建立的军事联盟时分时合，并不稳定。直到公元 386 年，在淝水之战中保存住实力的拓跋珪收集旧部，于公元 386 年正月，大会牛川，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二月，迁都定襄之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四月改号魏王。^[15]398 年迁都平成（今山西大同），拓跋人自此逐鹿中原。

拓跋鲜卑从离开“大泽”，抵达“匈奴故地”到迁都平成入主中原，第二次南迁前后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初到匈奴故地的拓跋鲜卑经历了连年的征战，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拓跋鲜卑遗迹、遗物甚少，但是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综合多种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百多年间游牧是拓跋人的主导经济生产方式。

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频繁迁都。穆皇帝拓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成为南都。帝登平成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灑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16]惠皇帝拓跋贺“以诸部大人情未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17]烈皇帝拓跋翳槐“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18]公元 340 年，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次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且从“昭成初欲定都于灑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19]可知，他们所修筑的不会是“筑城郭，起宫室”的都城，而是行帐都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先后修筑多座都城，往来迁徙定都，这种行帐都城的多次修建，体现出此时的拓跋鲜卑人具有极其浓厚的游牧文化特点。什翼犍在回应前秦苻坚时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20]公元 376 年，由于受到前秦苻坚之追击，什翼犍“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然而由于“不得刍牧，复度漠南”^[21]，亦可证明这一点。

在与周边部族的征战中，拓跋鲜卑的游牧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363 年，什翼犍“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牛马羊百余万头。”次年“讨没歌部，获牛马羊数百万头。”^[22]登国六年（公元 391 年），“十有一月戊辰，还幸纽垵川。戊寅，卫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己卯，车驾出讨。壬午，大破直力鞬军于铁歧山南，获其器械辎重。牛羊二十余万。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奔遁。壬辰，诏诸将追之，擒直力鞬。十有二月，获卫辰尸，斩以徇，遂灭之。车驾次于盐池。自河已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23]前文提到的力微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以及拓跋禄官有控弦四十余万；郁律时控弦上马者近百万。^[24]皆可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匈奴故地温润的气候、充沛的水草，使来到这里的拓跋人的游牧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游牧业不仅已在他们的经济生产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规模极为庞大。也正是以飞速发展的游牧经济作为后盾，拓跋鲜卑人才有能力在建国后不久的时期内具备了征服周边部族、统一北方、问鼎中原的实力。

四

398 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即皇帝位，改元“天兴”。从此拓跋鲜卑人入主中原，他所建立的北魏政权逐渐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代表北方的王朝，从此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公元 409 年（北魏天赐六年，东晋义熙五年），拓跋珪被杀，太子嗣继位，是为明元帝。423 年（泰常八年），嗣死，子焘立，是为太武帝。拓跋焘时，先后攻灭赫连夏、冯氏北燕和沮渠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自四世纪初开始的、为时达一百余年的北方分裂割据状态，与南朝刘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随后又西逐居于今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北降阴山以北的柔然，西域诸族都遣使朝贡。北魏王朝的势力日益兴盛。拓跋焘下传四代至拓跋宏，471 年（北魏皇兴五年，宋泰始七年）立，是为孝文帝，493 年（北魏太和十七年，齐永明十一年）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

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深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人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北魏前期，即北魏建国到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以前，作为传统的游牧经济，仍继续保持强大优势，同时，新兴的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拓跋部本是一支游牧民族来说，这意味着北魏的建立，开始了他们

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演变。但当时的北魏王朝未能提出完整而系统、明确的发展农业的方针和政策。在统治阶级内部倾向于游牧经济的各种表现相当强烈，农业生产时遭压抑和排斥。在当时作为新生事物的农业，它的出现和发展虽然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受以上诸多因素之影响，发展道路颇为曲折。故北魏前期，游牧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仍居主导地位。这也是必然的，在未统一北方，拓跋鲜卑所占领的完全适合农耕的土地并不广阔，而且处于常年的征战和开疆拓土时期，因为在部分区域内仍以畜牧业为主，也是明智的选择。可以说，在北魏初期，拓跋鲜卑人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使畜牧业与农业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

统一中国北方，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农耕区域，因此，在拓跋北魏占有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以及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合广阔的农耕区域和骤然增加的人口。因而深入中原地区后，拓跋北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农业经济成为北魏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统治基础。

五

回顾拓跋鲜卑的迁徙过程，看似平常的南移中却蕴含着波澜壮阔的变革。用表格总结：

时间	活动区域	经济生产方式	
		主要	次要
远古至公元前 1 世纪	嘎仙洞为中心的大兴安岭中	狩猎业	采集业
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	呼伦湖一带	游牧业	狩猎业
公元 2 世纪后半叶	匈奴故地	游牧业	
公元 398 年后	迁都平城	游牧业	农业
公元 439 年后	统一中国北方	农业	游牧业
公元 494 年后	迁都洛阳	农业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随着生存环境的转变，拓跋鲜卑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而每一次的变革都让拓跋人的实力、社会形态有一个质的飞跃。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拓跋人总是能找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势力才能不断地提升，不停地创造辉煌，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变革是成功的。

拓跋鲜卑社会内在经济发展类型,是由狩猎业为主,渐渐转为畜牧业为主,从畜牧业到畜牧业农业并重,再到完全农耕化,这是大多数北方游牧民族成长、发展、壮大的缩影。契丹、女真、突厥、蒙古民族的发展历程都与拓跋鲜卑的发展过程相似，只是拓跋鲜卑的发展轨迹更加典型、清晰。这一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游牧民族所具备的使自己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所处的自然条件相适应的能力。

将拓跋鲜卑的发展轨迹放在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考查。显而易见，这种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并不明显。但与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开疆拓土的农耕民族相比就更加一目了然。纵观中国历史，农耕王朝也曾经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尤其是向北、向西北。从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统一中国的秦王朝，汉王朝，都曾经长期或短暂地占据过北方草原地带，然而他们并没象游牧民族一样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而从事游牧业，而是始终都没有放弃和改变其农业生产方式。无论统治区域如何转变，不变的是他们从事的农耕经济。他们的这种盲目地从事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和效果。但是随之而来的生态灾难、经济衰退以及社会矛盾，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所占领的区域，重新回到中原地区。[\[25\]](#)

游牧民族这种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对今天的人们应该有所启发，拓跋鲜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

诉我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更重要是“与地俱进”，采取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经济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

注释

①认为嘎仙洞并非拓跋鲜卑起源地的观点主要见于下列文章：陶克涛“论嘎仙洞刻石”，《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周向永《“鲜卑”涵义考纲》，《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3期；李志敏“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4期。另见张博泉著《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6页。

②曹永年先生指出，此“神人”为檀石槐，只是被神化而已，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是在檀石槐的部署下进行的。（见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7年4期）

参考文献

[1] 魏收. 魏书·序纪[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1.

[2] 魏收. 魏书·序纪[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2.

[3] 白劲松. 从考古发现看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3, (2). 85.

[4] 米文平.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 文物, 1981, (2); 吉习发. 嘎仙洞调查补记[J]. 内蒙古师范大学报, 1985, (1).

[5] 林干. 东胡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81; 杨军. 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J]. 史学集刊, 2006, (7); 宿白. 东北内蒙古地区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 文物, 1977, (5); 黄烈. 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A].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C]. 第二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曹永年. 早期拖把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J]. 历史研究, 1987, (5); 靳维柏. 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J]. 北方文物, 1988, (3); 李逸友. 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A].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6] 姚大力.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

[7]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A]. 载魏坚主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4. 212.

[8]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A]. 载魏坚主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4. 216.

[9]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A]. 载魏坚主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04. 218—219.

[10] 黄烈. 拖把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A].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C]. 第二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11] 陈寿撰.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12]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A]. 魏坚主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22.

[13]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A]. 魏坚主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55.

- [14]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3.
- [15]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20.
- [16]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8.
- [17]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10.
- [18]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11.
- [19] 魏收. 魏书·平文皇后传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323.
- [20] 房玄龄等撰. 晋书·苻坚载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2899.
- [21]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16.
- [22]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14—15.
- [23]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24.
- [24] 魏收. 魏书·序纪 [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 [25] 谭其骧.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J]. 学术月刊, 1962, (2).

Research on Adaptive Ability with Natural of Nomads by South Immigrant of Tabyaci

By Tergel

(Research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Abstract: Tabyaci had experienced many times national immigrants, every immigrant made them new living environment. We can see the ability of changing economic production methods along with the changed living environment. The adaptive ability with natural of nomads made the nomads to become strong and conqueror. The adaptive ability is illumination for modern humankind. Experience of Tabyaci tells us that getting adapted production method with living environment is the correct road of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byaci; South Immigrant; Adaptive Ability with Living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 2009-9-20;

作者简介: 特日格乐 (1980-),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民族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